

## 略论蒲松龄的名士情结

王慧

(中国艺术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名士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主流思想相联系的。清初的乡村塾师蒲松龄满身浪漫气息, 却颇受当时经世致用氛围影响, 志在“勋名”, 尽管一辈子没能挤过科举的独木桥。他从未将自己当作名士, 却也会流露出被目为名士的自豪。在他笔下, 既有对名士的赞不绝口, 又让一些名士出尽了洋相。在他身上, 有以文论名的传统, 也有自己独特的痴与狂。

**关键词:** 蒲松龄; 名士; 聊斋志异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1-0076-06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开篇即为:“先生讳松龄, 字留仙, 一字剑臣, 别号柳泉。以文章意气雄一时, 学者无问亲疏远迩, 识与不识, 盖无不知有柳泉先生者, 由是先生之名满天下。”<sup>[1]</sup>确实, 蒲松龄可谓般阳名士, 可他却从未以名士看待自己。他在文集的《自序》中这样说:“吾邑名公钜手, 适渐以凋零, 故缙绅士庶, 贵耳贱目, 亦或阙牛而以犊耕。”<sup>[2]1007</sup>但在《木城隍碑记》中又写杨某母子因雕像成而“将求记于名手, 梦神人示现, 俾以记属余”, 他“自愧鄙陋, 因而笑其荒唐。乃诘其石之尺度短长, 石之名字名宽, 乃释然曰:‘是矣。神固谓石狭无余地, 不过俾知书者一记姓名, 近取之皇甫而以足, 何必劳劳道途, 远求名士也。’遂为之记”<sup>[2]1022-1023</sup>。申明自己不是名士的同时似乎又有着神灵以自己为名士的炫耀。而且, 在《聊斋志异》一书中, 蒲松龄既有着对名士的赞不绝口, 又让一些名士出尽了洋相。蒲松龄究竟有着怎样的“名士”情结? 本文试图对此做一简单探讨。

### 一、流俗口能为谤誉, 男儿志在要勋名

“名士”一词大约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季春之月] 勉诸侯, 聘名士, 礼贤者。”郑玄注曰:“名士, 不仕者。”孔颖达疏:“名士者, 谓其德行贞绝, 道术通明, 王者不得臣, 而隐居不在位者也。”《吕氏春秋·尊师》篇曰:“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 以终其寿。”意为以学术文章等著称的知名士人, 无论仕与不仕, 无论道德文章, 传统意义上的名士总是属于士人群体的, 与不通文墨的平头百姓无缘。作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阶层, 士人们几乎没有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的, 他们维护仁、义、礼、智、信相统一的道德规范, 固守君臣之义, 甚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而名士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名士又总是属于各个时期的, 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主流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因此, 名士的品格往往会变异。

以魏晋和晚明为例。“魏晋风度”、“名士风流”说的是当时名士的俊逸潇洒、超凡脱俗, 正

收稿日期: 2007-09-12

作者简介: 王慧(1974-), 女, 山东临沂人, 助理研究员,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小说

如台湾学者牟宗三所说：“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清则不浊，逸则不俗。……是则清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谈、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征。”<sup>[3]</sup>魏晋名士带有士族门阀制度下的贵族气息，晚明名士则大不一样。云间名士何云朗“觅得南院王赛玉红鞋，每出以觞客，座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长歌以记之”<sup>[4]</sup>，放诞风流中带有浓厚的世俗之气。在繁华绮丽的城市中，在奢侈享乐的浸淫下，晚明士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他们放荡不羁、追求世俗享乐的刻意风流是浪漫思潮勃兴、人欲横流的社会中文人自我意识逐渐加强的反映，更是对名教礼法的反叛，对传统名士的重道义、重操守、重淡泊宁静的人格理念的背离。明季的顾大韶叙述了隆庆、万历前后所谓名士的不同：“余生也晚近，然隆万间之风俗犹及见焉，维时之所号为名士者，必其翹然不为世俗之行者也；所号为名士之文者，必其卓然不为世俗之文者也。……其立己也固，其持论也严，其师匠必高，其声气必寡。盖隆万时犹然，而前此可推也。今则不然：复进之所奉为师匠者，不论其人其文，而惟取其名位之尊、形势之盛；先达之所引为声气者，亦不论其材其品，而唯取其请谒之勤，酒食之腆。论其人，即闾巷之俗子，犹弗取也，而忽曰名士也；课其文，上不足以欺有司，下不免于侪偶之笑，而忽誉之曰名士之文矣。”<sup>①</sup>这种差异恰恰表明名士内涵随着时代、社会、思潮等的发展在不断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可能已经走向其本义的反面。

明王朝的覆灭让清代思想界开始了对明代思想的全面反拨，尤其晚明文人放浪形骸、歌哭无端、生气勃勃的个性解放思潮更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三大儒力倡“经世致用”，倡言“文须有益于天下”，大开写实之风气。喜欢谈狐说鬼、满身浪漫气息的蒲松龄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浪漫与现实在他身上合二为一，而其自身的遭遇更让他的“名士”情结非同一般。

康熙四十九年（1710）春，淄邑行乡饮酒礼，71岁的蒲松龄与好友张笃庆、李希梅同公举为乡饮介宾，先生归作《口号》记之：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云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自怜自恨中依然有一股昂然向上之气。蒲松龄很传统，虽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甚至认为自己是“病瘠瞿昙”转世，但他一生奉行的都是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准则，他的愿望是“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sup>[2]1581</sup>，要为民请命，造福乡里。当意趣相投的好友孙蕙的家人奴仆横行乡里时，蒲氏毫不迟疑地致函孙蕙：“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sup>[2]1123</sup>为乡邻利益不惜得罪好友，冒犯权势。郢中社老友王鹿瞻的父亲被其妻逐出家门、弥留旅邸，而王却漠然置之，蒲氏闻说此事，立即写信痛斥。尤令人敬佩的是，他以71岁的高龄赴郡为民请命，先后上书王渔洋、谭无竞，终使蠹吏淄川县漕粮经承康利贞罢官。

蒲松龄文集中有诸多拟表（93篇）、拟判（66则），但我们无法想象其当官的政绩如何。蒲氏从未把自己当名士却挡不住别人将他目为名士，而名士往往成不了出类拔萃的政治家。袁宏道一个劲地叫作令难，“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sup>[5]</sup>，最终辞官不就。屠隆、汤显祖、臧懋循等人也因纵情越礼被罢免。蒲松龄的身上也充满着浪漫气息，但他认为名士、名臣应合二为一，他感叹自己一经终老，为名士之羞<sup>[2]1247</sup>，赞赏王渔洋“虽有台阁位望，无改名士风流”<sup>[2]1134</sup>。尽管蒲松龄终究未能进入仕途，但他既不悲观厌世、隐居山林，也没颓然自放、游戏人生，而是始终坚持儒家积极入世的心态，尽自己所能，教化风俗，谋利乡民。

## 二、惟是安贫守拙，遂成林壑之痴

蒋士铨曾作《临川梦》，第二出“隐奸”以净角扮大名士陈继儒，并在上场诗云：“妆点山林

<sup>①</sup> 见《钱尔弢读斋稿序》，转引自陈万益《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年，第64页。

大架子, 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间鹤, 飞来飞去宰相家。”蒲松龄不是云间鹤, 不愿奔走于权贵之家, 也没有陈继儒轻轻松松做名士的心得: “士人当使王公闻名多而识面少, 宁使王公讶其不来, 毋使王公厌其不去。”<sup>[6]</sup>除 31 岁那年唯一的远游外, 蒲氏一生都是在淄川乡间度过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中这样评价蒲松龄: “迨夫三十年放怀诗歌, 足迹不践公门, 因而高情逸致, 厌见官长。……至喻方伯成龙正庵见诗倾慕, 饬周邑侯兴安尽礼敦请, 先生高卧不起。毕刺史载绩先生际有父子劝驾, 乃肯一往。……此可知孤介之性情矣。”<sup>[1]3447</sup>“贫困荒益累, 愁与病相循”<sup>[2]1690</sup>的生活遭际让蒲松龄没有魏晋名士的贵族气, 也没有物质温床培育出来的晚明名士的世俗气, 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真性情——“狂”与“痴”, 这也是他笔下名士最动人处。

蒲松龄善用“痴”字, 有人统计, 《聊斋诗集》中这个字出现了 17 次, 《词集》中出现了 7 次; 而“狂”字亦是频频出现, “狂同昔日犹贪饮, 兴减当年并废歌”<sup>[2]1639</sup>, “乾坤一破衲, 湖海老狂生”<sup>[2]1659</sup>, “因之芳年华, 多为狂拙误”<sup>[2]1669</sup>……所谓“痴”, 是指情志专一, 不怕艰难险阻, 力图达到目的; 所谓“狂”, 则含有不甘寂寞、愤世嫉俗, 不与俗流合污之意, 二者相辅相成, 痴狂合一。在《钟圣舆以〈宪副公传〉见示, 即索诗, 因赋此》的“小引”中, 蒲松龄将自己的痴与狂表现得淋漓尽致: “某, 一世疏慵, 半生贫贱。情逢痴处, 绝无肺肠, 途到迷时, 惟知涕泪。闻骚雅之士, 辄至系夫梦魂; 耽文字之交, 直将依以性命。”正是这种痴狂劲头, 让他一生汲汲于科举之途, 屡败屡战, 也让他始终没有放弃《聊斋志异》的创作, 更让他在“世上何人解怜才”<sup>[2]1623</sup>的失意中引屈原、阮籍、李白为同道, 不气馁, 不妥协, 在坎坷之路上踽踽而行。

明中叶以来, 不断有文赞扬人的狂、痴、癖等不同于俗的个性。袁宏道说: “弟谓世人但有殊癖, 终身不易, 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 元章之石, 使有一物易其所好, 便不成家。”<sup>[7]</sup>张岱则说: “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可与交, 以其无真气也。”<sup>[8]</sup>程羽文在《清闲供》中则详论文人的六种“病”: 癖、狂、懒、痴、拙、傲<sup>[9]</sup>。有“病”才有个性、有情趣、有锋芒。蒲松龄不仅自己成为它们最好的注脚, 而且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痴、狂名士。如书痴郎玉柱(《书痴》), 石痴邢云飞(《石清虚》), 情痴乔生(《连城》)、孙子楚(《阿宝》)等。

痴人的身上往往有“狂”的个性。但“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蒲松龄在《狂生》一篇中为“狂”做了限制: “独是君子虽贫, 不轻干人, 乃以口腹之累, 喋喋公堂, 亦品斯下矣。”就象他在《答汪令公见招》第四首中所写的那样: “儒冠未达狂生刺, 呵叱恐遭醉尉加。踪迹迂疏应勿怪, 生平曾不到公衙。”一生偃蹇的蒲松龄决不会象济宁某狂生一样恃狎而骄, 他的狂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不平与自傲, 是“此生所恨无知己, 纵不成名未足哀”<sup>[2]1723</sup>的悲凉与愤世。

蒲松龄的“痴”和“狂”与他的“真”和“拙”是密不可分的。蒲箬曾这样描述父亲的性格: “惟是天性伉直, 引嫌不避怨, 不阿贵显, 即平素交情如饴, 而苟其情乖骨肉, 势逼里党, 辄面折而廷争之, 甚至累幅直陈, 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 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 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然, 不以为迂。”<sup>[1]3429-3440</sup>蒲氏自己也对这种天真烂漫、不加雕琢做出了最高评价。他在《宋七律诗选》跋中称赞宋诗佳句“秀丽中自饶天真, 唐贤所不能道也”, 在《与树百论南州山水》中这样评价南北山水之不同: “扬州有红桥, 廊榭亦萧敞; 余杭有西湖, 淳流亦滢泱。雕甍斗华丽, 名流过题赏。乃知北方士, 自不善标榜。江南之水北方山, 两物流峙皆冥顽。大江无底金焦出, 培塿直与江声传。何如劳山高崔嵬, 上接浮云插沧海!”高度赞美那种未加修饰与标榜、纯朴无华的自然美。

灌仲孺大概是他最喜欢的历史人物, “其胸与海同其阔, 其心与天同其空, 其天真与赤子同

其烂熳”，其“真圣贤也！真佛菩萨也”<sup>[2]1118</sup>！这种天真烂漫的外在表现即为朴拙自然，是蒲氏为人的最高准则，他在《寿常戩谷序》中大力赞“拙”：“老于世情乃得巧，昧于世情乃得拙，是非巧近伪而拙近诚乎？……伪而劳，其神敝，拙而逸，其神固，此天人之分，即修短之别也。”远巧而近拙，好诚而恶伪，修身自持，决不反悔。《拙叟行》可谓其内心最真实而又痛苦的自白：“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无须羨邯鄲。……何况世态原无定，安能俯仰随人为悲欢？君不见：衣服妍媸随时眼，我欲学长世已短！”这种“拙”大约是蒲松龄心底最深的痛，因为他无法随时俯仰，随波而流，一首《沁园春·戏作》表明了他不可更改的心迹：“常期勉改前非，须索把小人一伪为：要啁啾善语，怜人似燕；笑号作祸，连世如鸥。赚得苍苍，抛来富贵，鬼面方除另易衣。旋回首，向天公实告：前乃相欺。”

蒲氏不仅以朴拙自然来修持自己，同时也在《聊斋志异》<sup>①</sup>中塑造了不少具有这种性格的名士。永平名士张鸿渐在逃亡途中，见到《南华经》注，便“取就枕上，伏榻翻阅”，当狐女舜华“欲以门户相托”时，“张皇然不知所对，但云：‘不相诳，小生家中，固有妻耳’”（《张鸿渐》）。宛平名士周生“不肯作无媒之合”（《素秋》）；还有于去恶、钟庆馀、曾友于等。他们都不追求矫揉造作的清高放达，浑身散发着淳真朴拙之美。而开篇《考城隍》中令“诸神传赞不已”的“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以及“都忘其词”、只记得“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更表明了蒲氏一切都不刻意为之，崇尚自然，以真为美的思想。

这种自然在《黄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蒲松龄借菊精陶三郎说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而黄英的“妾非贪鄙，但不稍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而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既让菊花意象与千载而上的陶渊明紧密相连，让黄英在似乎俗不可耐的事业中自有一番风流与傲气，更表明蒲氏毫不做作，不讳谈钱的思想。“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气概固然令人敬佩，可谁又能鄙薄“仓箱讨得千钟粟，从空堕万铤朱提”<sup>[2]1991</sup>这种对金钱欲望的自然流露？

蒲松龄崇尚真，不喜矫揉造作，他曾在《沂水秀才》篇末将“秀才装名士”列为“不可耐事”之一。其塑造的名士形象的自然朴拙，既是自身最珍贵的品德，也是他心目中名士的一个标准。

### 三、拟携斗酒临高处，与尔论文天地间

蒲松龄是个文人，终究还是以文论名。顺治十六年（1659），即他连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后的第二年，意气风发的蒲松龄与同邑张笃庆、张视旋、李希梅、王鹿瞻结郢中社，为文论艺，激情自负。而他称赞别人为名士，也往往因文而起，“同门朱卷，开卷读半幅，便知为名士”<sup>[2]1132</sup>；李蓼园“志不屑乎时径，笔直接乎先民，名士见乎动色，宗匠讶其绝伦，因而名满海内”<sup>[2]1346</sup>。蒲氏自己的文章也写得好，施闰章批其入泮之作《蚤起》、《一勺之多》曰：“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sup>[2]1406</sup>王渔洋谓“聊斋文不斤斤宗法震川，而古折奥峭，又非拟李、王而得之，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sup>[2]1547</sup>。难怪他在《示儿》中告诫子孙并发出“读书原不求温饱，但使能文便可嘉”的慨叹。

蒲松龄还是个浪漫的人。他的诗词中与人诗酒唱和、登高送别的内容特别多，毕韦仲有赏桂之约，王八垓烹羊相招；和王如水登高送朋友，与诸同人上山赏桃花……他不仅写得出被王渔洋

① 本文所引《聊斋志异》原文皆出自任笃行辑校《聊斋志异》（全三册），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

誉为“缠绵艳丽，如登临春、结绮，非复人间闺阁”的《梦幻十八韵》，编撰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塑造了如许美丽多姿的少女，而且，现实生活中也时露多情气质。他为顾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并作诗记之：“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sup>[211580]</sup> 顾氏嫁给孙蕙后，蒲氏还因其工诗而作诗戏赠。诗中有“当日垂髫初见君，眉如新月鬓如云。数年围带知何似？闺阁才名日日闻”以及“今日使君万里遥，秋闺秋思更无聊。不知怀远吟思夜，拈断湘裙第几条”<sup>[211699]</sup>等细腻亲昵的句子。顾青霞死后，蒲氏更是写诗悼念，遗恨绵绵。“吟声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sup>[211725]</sup> 联系《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娇娜》、《香玉》等蒲氏对知己之情的赞美与艳羨，不难猜想，顾氏可能是蒲松龄一生中除了刘氏夫人之外唯一的红粉知己，其深情浪漫可见一斑。

蒲松龄其实是很有些名士气的。东晋名士王恭曾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此说被余嘉锡严厉批评：“自恭有此说，而世之轻薄少年，略识之无，附庸风雅者，皆高自位置，纷纷自称名士，致使此辈车载斗量，亦复何益于天下哉？”<sup>[10]</sup> 确实，只能饮酒读骚的轻薄少年往往是假名士，但名士常常是离不开酒与《离骚》的。

蒲氏也是如此。据其“寒香抱屋人盈座，可惜生平饮不豪”以及“从来饮少先成醉，又感知音发旧狂”<sup>[211773]</sup>等诗句来看，他酒量不大，但并不妨碍他“痛饮酒”，这只要看看他诗酒唱和的诗篇即可窥知一二：“斗酒难消块磊愁。”<sup>[211605]</sup>“豪襟欲纵酒为徒。”<sup>[211717]</sup>“对酒发狂歌，停杯时一晒。夜阑灯烛辉，放谈酒行紧。”<sup>[211826]</sup>……几乎是“日日清狂频贯酒”。酒其实是和他心中的孤愤紧密相连的，所谓“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原不解怜才”<sup>[211630]</sup>。不仅如此，他还以屈原为榜样，时时将《离骚》挂在心中，“于今世事难回首，龟册何须更卜居”<sup>[211579]</sup>；“《九辨》临江怀屈父，一尊击筑吊荆卿”<sup>[211579]</sup>；“寒更风露送微凉，一曲《离骚》夜未央”<sup>[211627]</sup>……这种饮酒读骚的狂放与悲愤是蒲氏穷与愁中的最佳慰藉，也正是古来名士流连诗酒、放诞风流的深刻内涵。蒲松龄文采出众、心系乡民，却连进入仕途的资格都未取得，所谓“天孙老矣，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sup>[211986]</sup>。这种巨大的落差加重了蒲氏身上的悲剧氛围，“数卷残书，半窗寒烛，冷落荒斋里”<sup>[211986]</sup>，也让他的名士韵味更加耐人咀嚼。

蒲松龄欣赏古名士的风度。他称赞马仁趾“有古名士风”，其引为同道的屈原、阮籍、陶渊明等皆是如此，所谓“古道不应遂泯没，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sup>[211818]</sup>，“高岸可为谷，性拙终不移”<sup>[211661]</sup>。蒲氏不喜欢那种追求享乐、品格卑微的所谓“名士”，这只要看看《聊斋志异》中许多名不副实的名士即知。他们或只知逞口舌之利，却连狐女也斗不过；或放纵无行，留恋软玉温香。最惨的名士大概属《彭海秋》中的丘生了。丘生“是邑名士，而素有隐恶”，竟被仙人变作一匹马，蒲氏在“异史氏曰”里对其大加鞭挞：“马而人，必其为人，而马者也；使为马，正恨其不为人耳。”《胭脂》中宿介虽“东国名士”，但“放纵无行”；“东昌名士”王子安品格卑下，为狐奚落；《绩女》中“邑之名士”费生“倾其产”，只欲一睹绩女之芳姿；《辛十四娘》中的广平冯生亦不过“乡曲之僮子也”。蒲氏还在《田七郎》中借梦中人之言告诫武承休结交知名士“皆滥交耳”；在《狐联》中借狐女之口发出了“名士固如此乎”的揶揄。

在那个以科举论成功的时代，蒲松龄实是不应留名。可就像明代徐师雷所说，“惟名士必有令名与绝盛之名、无穷之名也”，“超然不凡之谓名士”<sup>[11]</sup>，蒲氏正是如此。他不仅得到当时天下闻名的江南施闰章、新城王渔洋的赏识，而且深得乡民爱戴。他天真烂漫，朴拙自然；他不畏权势、造福乡里；这些伴随着蒲松龄的科举人生，在诗酒风流的狂放与无奈中成就了《聊斋志异》

的千古独秀，也造就了蒲氏的超然不凡。他想做名臣，可历史没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不想做名士，虽然内心深处的自怜与自傲、悲愤与狂放让他对自己的名士气有一种忍耐不住的流露，历史的长河中却留下了他光辉的身影。

或许八股文造就的假名士太多了，清代人对“名士”多无好感。蒋士铨曾作剧加以讽刺，大名士纪昀也不喜欢“名士”二字，其门人盛时彦在为《阅微草堂笔记》作的《序》中这样说：“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而吴敬梓更是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儒林中大批只知沽名钓誉、毫无真才实学的假名士，并在结尾推出真正的名士——市井四大奇人，另一类名士时代已经到来了。

#### 参考文献

- [1] 盛伟. 蒲松龄全集: 第3册[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8: 3435.
- [2] 盛伟. 蒲松龄全集: 第2册[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8.
- [3] 牟宗三. 才性与玄理[M]. 台北: 学生书局, 1985: 68.
- [4]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卷二十三《妓女》[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640.
- [5] 钱伯城. 袁宏道集笺校: 上册卷五《杨安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13.
- [6] 曹臣. 舌华录[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19.
- [7] 钱伯城. 袁宏道集笺校: 下册卷五十五[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597.
- [8] 张岱. 陶庵梦忆: 卷四《祁止祥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72.
- [9] 程羽文. 清闲供[C]// 虫天子. 香艳丛书: 三集卷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693.
- [10] 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764.
- [11] 陈仁锡. 明文奇赏: 卷三十九[M]. 刻本. 天启三年.

## On the Attitude to Celebrity of Pu Songling

WANG Hui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China 100029)

**Abstract:** Celebrities are always relevant to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main ideas of certain period. Pu Songling, a romantic teacher on countryside in the Qing dynasty, didn't pass throug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But with the affection of his time's utilitarian theory, he still wanted to gain official rank. He didn't think that he was famous, but sometimes he was proud of being regarded as a celebrity. In his works, he spoke highly of some of the celebrities and also laughed at others. Although Pu Songling followed the tradition of evaluating a person by his articles and poems, he often had his unique characters.

**Key words:** Pu Songling; Celebrities; *Liaozhaizhiyi*

(编辑: 饶道庆)